

内江縣文史資料

(第六期)

内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政协内江县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七月

目 录

记内江县东乡农民运动	中共内江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
张居弟(方士廷)烈士的英勇就义	县党史资料征集小组	(8)
廖维民同志在长宁夏场遇害经过	县党史资料征集小组	(8)
黎光谦烈士的壮烈牺牲及其生平事略	黎裕康供稿	(9)
吴笔耕同志的革命经历简介	吴星海	(10)
日寇飞机轰炸内江的罪行	傅科整理	(12)
抗日时期内江的群众救亡宣传运动		
—记内江兴华救亡歌咏话剧社	郭延东	(15)
组织内江兴华救亡歌咏话剧社回忆片断	梅志尧	(19)
·江城书画舫· 四、杨所修擅画墨竹与其家传	白 马	(20)
·汉安诗词丛话· 九、留坝县侯祠的赵贞吉《怀山词》碑		
十、张应登《过白水峡读摩崖碑》摩崖诗	陈显远	(22)
【花萼琐记】(三) 乡学林著述《书目》钩沉(上)	洪庐	(24)
刘师亮对联选录(二十二则)	如 然辑集	(30)
△ 图片: 县东乡农民运动大会会场杨家场关帝庙 [明]赵贞吉词碑(封二)		
日机轰炸内江示意图(封底) [明]杨所修墨竹(封三)		
被日机炸伤老人邱淑兰与炸塌修复房屋(插页)		

记内江县东乡农民运动

(1925年—1930年)

中共内江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地处成渝中心的内江县，被沱江河分割为东西两部分，习惯上东者称为东乡，西者称为西乡，东乡占全县面积的三分之二强，西乡仅占三分之一的样子，西乡人口密集，东乡大部地区人口较稀。

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中国共产党虽然与国民党建立了民主革命联盟，却始终坚持着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自主的方针。一九二五年秋，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同年，内江县人共产党员黎灌英由重庆回到内江，发展了廖释惑、傅冰洋、谢独开等同志入党，随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内江县特别支部，黎灌英同志任书记，为了以合法的方式，开展革命的斗争，黎灌英同志利用了团练这个组织。

内江县团练局把县境划为四个团练区，每区设一大队，东乡分为两区建两个大队——东区大队和南区大队，“大队”既是训练组织，也是剿匪组织，东区大队辖田家、三溪、高梁、永福、杨家、白合六个乡的团队，以高梁为指挥中心，南区大队辖石子、华山、平滩（坦）、观音滩、永兴、一缌滩、椑木镇七个乡的团队，以观音滩为指挥中心，谢独开同志任南区大队长，为了培养东乡农民运动的骨干，掌握地方武装，决定开办“民团干部传习所”，黎灌英积极展开活动，借当时较为开明而有声望的曾任讨袁第一军驻渝办事处处长的高一白和曾任白合乡团总的傅尧轩的名义，将东区大队、南区大队联合组成“东乡联团”，以便吸收东乡农民参加学习，“民团干部传习所”地址设在白合场三圣宫（现白合粮站）。“传习所”招进学员一百一十余人，编为三个分队，九个班，黎灌英为教务长，谢独开负责军事训练，兼第一分队分队长，第二分队长为奉德章（本地人，当过连长，倾向进步），第三分队长为李轩（本乡人，读过高教班），教员有共产党员钟伯勋等人，司务长为陈西北（倾向进步），“传习所”学习分政治、军事两科，黎灌英担任政治课，他自编教材讲授，并印成材料发给学员。主要内容：一是为什么要开办民团干部传习所；二是帝国主义利用传教、文化、经济、军事、政治侵略中国的罪行；三是军阀投靠帝国主义争夺地盘的残暴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横征暴敛，鱼肉人民的野蛮罪恶；四是宣传马列主义，传播进步思想。军事课由谢独开同志担任。主要内容有军事操练，实弹训练及野外演习，以及军事纪律等。“民团干部传习所”开办不到三个月，被县团练局长李汉文等觉察，勾结军阀王缵绪，由其师部的政治部主任钟汝为饬令停办，经黎灌英的辗转努力，终将“传习所”迁至富顺县三多寨继续办下去。“传习所”的学员中，傅冰洋先被发展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不久，和黎存中、唐爵廷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傅冰洋为东乡白合场地下党

支部书记，唐爵廷为东乡石子镇地下党支部书记，很多学员，回到各乡后，大都成为东乡农民运动的骨干，东乡的“民团干部传习所”的功绩，就在于为以后的农民运动作好了干部准备。

一九二七年二月起，中共内江特支便以农村工作为中心，根据上级党提出的要求，决定以东乡为中心，大力发展会员，各乡公开成立农会。农会都有统一的旗帜——在青天白日旗的正面下面加一犁头图案。中共特支指定唐爵廷负责农协工作，东乡农民运动发展迅猛，在唐爵廷的直接组织领导下，石子乡徐家坝么店子设了农民运动的联络点，附近的邱家湾、唐家湾、石谷嘴、邱家坝、川山洞、豹子湾等地，有300多农民参加活动，在禹王宫召开了农民大会，成立了农会组织。傅冰洋与谢骥才在东乡白合场建立了黄连嘴，以及邻近的桐麻冲、吴勰编等地的农民组织，并在白合场的土拱桥、板板桥、烂寨子等处召开过农协会员大会，谢骥才同志在东乡的观音乡（观音滩）建立了农会，在凤兴寺开大会，最初只有两三百人，一次比一次多，由四五百人，最后达到两千人，使当地封建势力大为震惊；谢骥才为了宣传革命道理，过年时，在黄家坝河边土地庙写了“资本高尚剥削，土地何不平均”的对联，横额是“土地革命”，观音乡发展会员之多，为各乡之冠。黎灌英同志组织起了东乡的观音井、马浦堰等地的农会。在两三个月之内，东乡各地农协组织的会员大大发展，在建立农会、发展会员过程中，提出的口号是：“农民组织起来，打倒地主、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并号召打击恶霸，反对苛捐杂税。还印发了有反帝反军阀内容的《国民革命三字经》。农协会员唱起了反土豪劣绅的歌谣。东乡农民运动形成了第一次高潮。

一九二七年三月，四川军阀刘湘在重庆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三一”惨案，同年四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破裂，随之内江出现白色恐怖，公学停办，明令撤销国民党左派县党部，共产党员组织疏散，黎灌英、黎存中、傅冰洋、何燮中、张敏行、高戢黎（后为叛徒）钟金吾、吉俊等先后到了彭县旷继勋（共产党员）部队，内江特支停止活动，东乡农民运动也就基本停止了。

八一南昌起义后，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一九二八年二月，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员会。

一九二八年六月和八月，中共川南特委分别派邓可非（女）、刘力生同志来内江，与地下党员黎光谦、黎守中、傅冰洋等同志取得联系，恢复了地下党组织——内江临时县委，并在组织中传达了中央关于四川农民运动的方针，以及省委关于“发动群众，进行抗粮、抗捐斗争”的精神，内江临时县委，由刘力生同志担任书记，傅冰洋、谢骥才两同志任委员。在临时县委的领导下，东乡农民运动又蓬勃开展起来了。

内江县的东乡，大部地区离城较远，特别是观音滩、杨家场、石子镇地处偏僻，接壤荣昌、安岳，最远的离县城一百多华里，因而反动政府鞭长莫及，地方反动势力也较薄弱；地下党员较多，党的组织较强，农会有基础，骨干甚多，加之农民受压深重，赤贫者多，最易接受革命宣传。所以东乡是发动农民开展斗争的好地方。在反动统治下，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内江县团练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向全县摊派“地亩捐”，不论自耕农、佃农，均按每亩六升征收，进一步加重了水深火热的农民的经济负担。内江县东乡的农民在地下党领导下，英勇地展开了反对地亩捐的斗争。

一九二八年夏，临时县委在全县布置了秋收抗捐斗争。秋，县委委员、内江县东乡观音

乡农协会负责人谢骥才，领导观音乡农民，以该乡团练大队长谢芷塘为对象，进行反抗地亩捐的斗争，因他无斗争经验，低估了敌人的力量，亲自出面，带领少数农民，在茶馆、酒店找地主豪绅要钱缴捐，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密报县府，将他逮捕。因敌人无确切证据，一月以后由他家里卖了二十多亩田土，以行贿的方式，将他救出。这次斗争虽然遭到了失败，但东乡农民的斗争并未停止。

年底，县委又组织东乡的永兴乡农民，趁团阔头子李汉文为母做寿，进行抗捐斗争。县团练局局长李汉文，长期把持地亩捐，中饱私囊。在其母生日之前，便以别人之口，说出他要为母做大寿，各乡团总和大队长心领神会，便纷纷以送礼为名，拿出农民含辛茹苦上缴的地亩捐款，变象地向李汉文行贿，为他们贪污捐款，打下基础。县委根据其大摆筵席，搜刮民财的事实，组织力量，大贴标语，散发传单，以“假孝子、真强盗”为题，揭露他利用职权变象贪污亩捐，压榨人民血汗，称霸一方的罪行，使农民逐渐看清了团阔、土豪的真面目。

在广大贫苦农民革命情绪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县委因势利导，年底在东兴乡江家花园召开会议，讨论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入农村，以贫雇农、中农和农村知识分子为对象，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发动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会议极大地推动了党的组织建设和农协的发展。仅数月，党员人数就由原来的二十余人发展到了近百人，并建立了东乡的杨家乡、石子乡、观音乡和白合乡四个支部，平坦乡建立了一个小组。东乡各地农协组织迅速发展，仅杨家乡周围，就有静居寺、杨泗庙、王家庵、正兴寺、华藏寺、仰觉寺、普国寺、雷家寺、诸古寺、棺木堰等十个农协据点，并以静居寺为中心，拥有农协会员七、八百人，由周执中、闵乐山负责。此外，石子乡有会员三百多人，由唐爵廷负责；观音乡有会员三百余人，由谢骥才负责。东乡的白合、平坦、新店、高粱等乡也成立了农协会，整个东乡共发展会员两三千人，并拥有土枪二百余支。

各乡农协会在党的领导下，秘密调查和分析了各乡地富与贫雇农民的情况，确定了斗争对象和依靠对象，利用地亩捐和年关地主逼债，积极开展斗争。首先是大造社会舆论，以广大贫雇农民，被地主逼得不得不靠典当衣物，甚至出卖自己的亲生骨肉的现实，来揭露当地土劣剥削压迫人民的罪恶，使广大贫苦农民看到农协会是为穷苦大众谋利益的，是可以信赖的组织。

一九二九年初，改临时县委为正式县委，由宋毓平任书记，廖释感、傅冰洋任委员。接着又组织成立了中共内江县东乡区委，由洪渊德任书记，曾旭东、唐爵廷、谢骥才任委员，加强了东乡农民运动的领导。

不久，中共自贡特别区委派曾荣同志来内江负责县委工作，宋毓平调走，曾荣同志来内江之前，就一直在搞农运，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被荣县农民称为“农王”，在群众中威信很高。他来到内江以后，深入东乡各地了解情况，准备开展秋收抗捐运动。农历五月，县委在东乡的石子乡吴王庙开会，由曾荣同志主持，参加人员有洪渊德、曾旭东、刘公道、周执中、唐爵廷等，主要讨论研究如何开展秋收抗捐斗争问题，石子乡支部书记唐爵廷提出：这次斗争应先把我乡凶狠毒辣的团总李义和等人除掉，再在各乡展开。鉴于观音乡斗争失败的教训，大家认为这样做必定引起敌人的报复，不可盲动。杨家乡支部书记周执中又提出：杨家乡副团总王奉宜和一些“方保”（当时杨家乡分为东南北中五个保，大家俗称各保的保长

为“方保”）以及绅士潘吉卿、王明谦、王松之、王厥章、周奉祥等与正团总刘芳杨财务收支员周俊卿、团练大队长夏庭光有矛盾，争夺杨家乡团练的实权，我们可利用他们争权夺利之机，在杨家乡开展抗捐斗争。会议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决定这次秋收抗捐斗争，以东乡为重点，利用团阀集团内部的矛盾，首先在杨家乡展开，斗争方式以抗缴地亩捐为主；目的是减少农民的经济负担，切断反动团阀武装的经济来源，解散县团练豢养的五个中队兵力，削弱反动团阀的力量，把枪收回农村，以利农协夺取武装，准备减租、减息斗争。最后大家为更好地宣传鼓动群众，编拟了春、夏、秋、冬四首歌谣，即《四季歌》，歌词为：春：春来百花开满林，米口袋撤紧，无心去玩春，工农同志要谋生，军阀应打倒，土豪要肃清，同志们下决心，努力前进。革命大功，即将告成。夏：夏日田中谷子黄，拌桶乒乓响，可望吃糟粞，背时军阀真堪伤，捐款多花样，催兵如虎狼。挑黄谷，折苛捐，五拖六抢，看着看着，抢得精光。秋：秋来桂花满园香，军阀又打仗，人民遭大殃，丘八爷下四乡，挑抬拉汉子，陪睡拖女娘，倘若不依从，要板要轍，钢枪一响，命见无常。冬：冬日天寒雪花飘。年关已将到，穷人心更焦。儿啼饥女号寒，衣服当完了，红（苕）没一条，债主家中逼，如何是好？起来革命，才有下场！《四季歌》是唤醒民众的先声。县委还以“内江县农协筹备处”的名义，发布了《内江农民协会秋收斗争宣言》：

“亲爱的工人兵士贫民及全体同胞们！

我们农民一年辛苦换来的秋收快要到了！我们在将要到来的秋收之前，我们想起：

我们农人，一天做到黑，一年到头，一生做到老，为什么还是红苕吃不饱，衣裳没有穿，房子稀巴烂，年年过这牛马不如的生活？军阀豪绅地主们，一天要到黑，一年要到头，一生要到老，为什么却美衣玉食，高楼大厦，享不尽那神仙般的生活？

啊！他们不过是靠着几杆枪，几块田，威逼而无情的常用苛杂重租重息压榨我们，把我们多数人千辛万苦做出来的略（掠）夺去，供他们少数人的安乐，这种极不人道的行为，他们都认为是‘天经地义’。

我们被军阀豪绅地主的残酷剥削已经受够了！眼前秋收，又是军阀逼税，地主逼租，债主逼债的生死关头，我们欲忍受下去，奈何今年天旱，收获的当然不够，狼心狗（胆）的军阀豪绅地主们的无恶剥削，我们逼得无路，只有号召我们全内江的农民，坚决执行以下的各项决议：

1. 全县农民团结起来进行秋收斗争！
2. 工人兵士贫民团结起来保护秋斗胜利！
3. 实行见打平分！
4. 反对先种后种！
5. 反对加租夺佃！
6. 反对大利盘算！
7. 取消一切苛捐杂税！
8. 长年工资三百钏零工一千二百文！”

宣言道出了广大农民的心声，指明了只有起来斗争，起来革命，才有贫苦农民的出路。会后，东乡各党支部传达了县委会议精神，在群众中教唱《四季歌》，宣讲《宣言》以激

发斗志，曾菜、洪渊德、曾旭东等人也深入各乡，分别领导杨家、石子、白合、平坦等地农协，利用赶场之机，于街头巷尾，向群众大讲：“县团练名曰办来防匪，但他们平时都住在城里，土匪在乡下抢劫，远水救不了近火，出了亩捐，绅粮得不到保护，而穷苦农民，连吃饭穿衣都困难，则无需保护，更不应缴纳亩捐，地亩捐是政府强加给广大贫苦农民头上不合理的捐税。”顿时，各乡农民革命情绪高涨，纷纷起来抗缴亩捐。

县委为了更好地组织开展这场斗争，曾菜、曾旭东、洪渊德、刘公道等四人，于农历六月某日到杨家乡，在静居寺召集周执中，闵乐山等农协负责人开会研究斗争的具体安排，会议分析了当时东乡的情况，小土地出租，自耕农和佃农反对地亩捐情绪最高，最后决定：为减少阻力，促进农村阶级分化，团结贫苦农民，则首先提出反对五亩以下亩捐，利用地方团阀内部的矛盾，成立以农协为领导的各界人士参加的“清账委员会”，以清查杨家乡团练财务收支员周俊卿的团费账目为突破口，展开斗争，争取地方一般士绅、知识分子等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以扩大影响。会后，马上部署了这场斗争，由周执中暗地活动，选定了王厥章、潘吉卿、周奉祥、闵安国、雷宝书、周善卿、王奉宣和农协会的陈文山等十余人，组成了“杨家乡清账委员会”，再由清账委员会指派王鸣谦、庹恒章、田光和等五人，组成了“查账团”，进行查账工作。查账团经过月余紧张工作，把周俊卿以及其父（前任财务收支）所经营的历年亩捐进行了清查，发现周俊卿侵吞亩捐黄谷一千五百余石。清账委员会，即刻将这一查实情况，张榜公布，让群众了解，使周俊卿无词以答；接着又将这一事实，上控县团练局，县府和省府以及各有关部门。豪绅官僚互相勾结，层层包庇，上控月余，均无反应。在县委的领导下，于农历九月初五，赶场之日，组织了杨家、石子、苏家等乡农民约七、八百人，到杨家乡团练局请愿，张贴标语，高呼口号，举行示威游行，提出免收五亩以下地亩捐。团总刘芳杨在群众压力之下，当面答应了缓征亩捐，向上请免，暗地又密告县府，没过多久，县政府就发出告示：“亩捐是办团专款，民八以来，无人请免。今杨家乡农协请免五亩以下亩捐，恰合共党入党资格……”告示激起了农民愤怒。县委为了打击敌人，进一步地开展斗争，由曾菜同志主持，于十一月十二、十四两日在杨家乡召开了农协执委组长联系会议，研究决定以杨家乡农协的名义向县政府提出质问，随即草拟并发出质问书：

“.....

今年天干，农民仅得五分以下收成，五亩以下农民，收谷已不够一家吃饭穿衣，更加两月秋雨，小春种不下，红苕被水淹坏，农民生活难免无法维持，那还有担负团款的力量？本诸天干水旱免捐恤民的事例，农会减免不当，何得诬为共产？不准减免，此应提出质问者一。

亩捐是办团的专款，团练是保护绅粮的东西，这样讲来，我们五亩以下的农民本该不负一点责任，今天派操了，派人巡守，已是本着有钱人出钱，无钱人出力的公理，那些富户人家，出点臭钱，抱着娇妻美妾，一晚睡到天亮，我们贫苦工农，风雷雨雪，黑夜巡守，每亩还要缴六升亩捐，这是何等不平，此应提出质问者二。

周俊卿收支两年，吞款六百多石谷子，一千多块银元，业经算账，我等查出有证可凭，这笔公款不去追收，又毫不追究，反迫我们五亩以下的农民出纳捐款，熟铁不打炼生钢，是何道理，此应提出质问者三。

知事说（告示），五亩以下农民，恰合共党入党资格，内江县五亩以下农民何止十万

家，还有佃农、雇农及无产工人都是共产党吗？你要保护绅粮，剥削工农，尽直截了当的说，何必拿共产党来压我们。此应提出质问者四。

……

“质问书”条条击中了敌人的要害，说出了广大贫苦农民的苦衷，更加激起了农民抗缴地亩捐，反对团阀的积极性，斗争形势空前高涨。县委抓住时机，一面进一步派闵乐山、周健民、王尊安等人，分头到各农协据点，昼夜集会宣传，揭露周俊卿贪污地亩捐的罪行，揭露地亩捐名目办得，实为害民肥己的不合理的状况。另一方面，为了扩大影响，争取社会各界的声援，发函联系旅省同乡会和旅省同学会支援。旅省同学会廖维国（共产党员）等人，组织散发了铅印“快邮代电”，将东乡的杨家乡抗捐斗争情况印发各地，大造社会舆论；旅省同乡会邓必修（会长）、陈占枝、肖翼之、谢仿昭、彭彼南、王亚南等也通过各种形式支持农会，震动很大，影响极广。这时内江执政当局，慌了手脚，县长魏宗晋，县团练局长李汉文马上指派东区团总陈书元到杨家乡监督检查。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陈书元等人来到杨家乡监督检查，当天正好是杨家乡逢场，查帐地点设在关帝庙。农协会事先已有准备，县委组织了杨家、石子、白合、苏家、高梁、观音等六乡约三千名农协会员，每人身藏一杆三角小旗，曾菜、曾旭东和周执中三人杂于群众行列中，暗地指挥，闵乐山、陈文山、陈清廷等人则出面公开领导。事前规定了见举旗就开始游行的暗号，布置了暗哨监视敌人，还安排了撤退路线以备发生意外。上午十时，查帐开始，农协会员有组织地集中在关帝庙坝内，赶场的群众也有不少人围观热闹，整个关帝庙大戏坝内外都挤满了人，戏楼上坐有“查帐团”人员和乡团总刘芳杨、副团总王奉宣、财务收支周俊卿、乡团练大队长夏庭光、东区团总陈书元和他的四名侍卫，以及团丁二、三十人，持枪守卫，气势汹汹，妄图威慑。在清帐过程中，陈文山、陈清廷等人在楼下高声说：“今天大家来算帐，你们一定要搞归一。”夏庭光站在楼上大声说：“嗨，你们闹杀了！”这就激起了群众的不满，高呼：“打倒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税！”“不准再收五亩以下地亩捐！”……呼声刚起，大家又静了下来，等待查帐结果。上午十一时许，查账结束，“查帐团”公布了结果，周俊卿极力申辩，均被我方据实驳倒。这时，区团总陈书元又站出来，代为申辩，说周俊卿经手的亩捐谷，收支差额没有一千五百余石那样多，这就更加激起了农民的愤怒，纷纷高呼“打倒周俊卿吞食农民血汗！”“打倒贪官污吏！”……乡团练大队长夏庭光提起手枪，走到台口，妄想镇压，凶神恶煞地说：“你们要做杀子！黄泥巴脚杆，是对的，就给老子上楼来嘛！”话声刚落，陈文山把旗子拿出举手一挥，大吼一声“给他冲上去！”顷刻间，愤怒的人们如猛虎般地冲上戏台，……由于楼朽人多，经不起这般压力，有三根楼梁被压断，楼板坠落下来，尘烟四起。这时，大家把身藏的小旗拿了出来，插在后颈衣领上，上面写着“农民协会”等字样。怒吼声、口号声响彻云霄，团总团丁吓得面如土色，纷纷跑回乡团练局驻地三圣宫。周俊卿一脸都沾起墨水，群众见状，都说他吃雷吃多了，雷把他脸都打黑了。他吓得直打罗嗦，由两个团丁扶起跑回三圣宫，藏在保管室里。曾菜等领导人，见楼板垮后，只伤了两三个摆摊群众，便马上组织大家上街示威游行，闵乐山、周永弟等人上街贴出标语和“告农民书”，署名东乡农民协会。游行队伍声势浩大，高呼“打倒周俊卿！”“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向团练驻地三圣宫涌去，街上的居民、商人和赶场的农民都纷纷入队参加游行。当游行队伍来到

团练局驻地三圣宫门口时，守门的团丁不准进去，陈文山、陈清廷等带领大家冲了进去，顿时，三圣宫内外都挤满了人，大家纷纷要求周俊卿、陈书元出来回答问题。陈书元刚露面，农民就是一阵吼声，要把他拉出去打。他见人越来越多，吓得从后门溜走了。这时，已是午后四、五点钟了，大家从上午到现在，水食未进，可精神抖擞。为了达到这次斗争的目的——免缴五亩以下地亩捐，经曾菜、曾旭东和各乡农协负责人商量决定，要求团练局派人出面答复农民的要求，结果由副团总王奉宜出面答复，免征五亩以下地亩捐，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各乡会员在负责人的领导下，有组织地撤到了文昌宫门前坝内，由曾菜同志讲了几分钟话，队伍便散了。最后，曾菜同志又集中了各乡的负责人在文昌宫内开了个短会，总结了这次斗争的成果，决定继续在各乡开展斗争，夺取更大的胜利。

这次东乡农民反抗“地亩捐”的斗争，震动了全县，乃至于全川，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宽，实属罕见。它狠狠地打击了土豪劣绅反动团阀的嚣张气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斗志。

不久，反动派发现这次斗争有共产党的领导，派警察中队长祝华丰率一个中队警察，到杨家乡进行搜捕，并且长期驻防，镇压农民运动。同时，发布通缉令，通缉王尊安、闵乐山、周永弟、陈文山等四人。王尊安、闵乐山、周永弟因得悉敌情而幸免，唯陈文山被捕，形势十分紧张，曾菜、曾旭东等领导同志也停止了活动，于年底调离内江。

曾菜、曾旭东走后，县委工作由还未被敌人发觉的洪渊德同志临时负责，他同东乡的石子乡农协领导人唐爵廷、程星斋等，于一九三〇年初又发动了一次反年关逼债的抗捐抗粮斗争，组织三百余人，贴出了标语。但因杨家乡秋收斗争后，反动派加紧镇压，在斗争行动之前，外围组织“铁血团”团员李潜居得知反动政府要逮捕洪渊德、唐爵廷、程星斋、赵怀安等人，立即找其弟李国斌通知了洪渊德等人。在此情况下，洪渊德、唐爵廷等人撤离内江，使这次斗争未能实现。在反动政府大肆镇压东乡农民运动的情况下，东乡农民却仍在党和农协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着艰苦的斗争。

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川南特区派高伯礼（化名郭朝栋，内江县华山乡人）回内江担任县委书记，黎光谦、廖释惑、周执中、傅冰洋任委员，继续领导东乡农民进行斗争。鉴于“杨家乡暴动”之后，敌人已注意杨家、石子等地，便将农民运动的重心移到了东乡的华山、白合、观音、杨柳等处，在这几个乡积极发展农协组织。这时，由于县委受第二次“左”倾路线的影响，轻视了敌人的力量，急于求成，于四月初，在白合乡诸古寺召开大会，错误地批准了石子乡提出的杀掉乡团总李义和等人的请示报告，并准备于城乡进行武装暴动。会后，农协会公开在各乡贴出标语“打土豪，杀劣绅，土地收来大家分！”……高伯礼一面在东乡的华山组织农民准备暴动，一面又组织力量在城内大贴标语，这些活动，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敌人加紧了侦察，后因地下党员陈杰在城内贴标语被捕，捕后叛变，于是暴露了县委组织，以至廖释惑、傅冰洋、黎光谦、张继文等人相继被捕，于同年农历八月四日一齐被敌人杀害。内江县地下党受到了一次严重的破坏，东乡农协会也受到了极大的损失，斗争暂告停息。

从东乡农民运动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革命斗争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农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只要路线正确，策略对头，就能夺取革命的胜利！

附记：在内江县东乡农民运动的调查了解中，我们得到了杨家公社党委、杨家文化站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当时从事地下工作的刘建纯、王尊安、陈西北等同志的协助，深表感谢。

张居弟（方士廷）烈士的英勇就义

县党史资料征集小组

烈士张居弟，字仲安，化名方士廷。生于公元1909年旧历十月十二日。父名张端五，母曾氏，弟妹八人，家境清贫，仅有少量干土，难以为生。原住家内江县凌家场新房子，即现凌家小学新校址。

张居弟因童年家贫，只读了四年私塾即行休学。1924年元月，离家去大坎堡太源井当学徒，由于盐井停推失业。1925年又到自流井八店街富源顺商号当学徒，1927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秋，在中共川南特委派赴自贡组织特别支部的共产党员肖凤阶同志领导下搞工人运动，1929年春张居弟光荣入党。随即担任大坎堡水车小木工组成的儿童团领导，并负责特支的通信联络工作。

1929年春因盐井“抽签轮推”，资本家无理解雇，工人生活困难，四月二十八日特支领导工人进行合法斗争，公开找资本家算账。

张居弟和肖凤阶两同志，于1929年八月十日被军阀队伍围捕在活观音庙里（张居弟同志当时化名方士廷）。1929年八月二十一日晨，即被杀害，地方上的人只知道是肖、方两烈士在大坎堡云流井英勇就义。一直到1949年自贡，内江解放经查证才知道牺牲的方士廷烈士，即张居弟同志，死时年仅一十九岁。

烈士张居弟未婚。烈士已病故，以下的几个兄弟除三弟另更名不知去向，四弟远良已故外，五弟志良，六弟居义现住内江县凌家区五一公社，二妹早死，么妹淑群现在重庆。解放后自贡市人民政府将其母与七弟居廉接到自贡，母亲选为人民代表，七弟在大安小学任教，六弟在内江参加工作。现张母已于1980年在自贡病故。

（世杰根据自贡市《井盐史通讯》等资料辑录）

廖维民同志在长宁夏场遇害经过

县党史资料征集小组

廖维民同志，是在长宁县夏场牺牲的。据《南溪县文史资料》第二辑刊载，南溪县政协副主席张君甫写的，《张云龙烈士小传》一文中，提到了有关廖维民同志牺牲的经过情况。现抄摘如下：

“一九二九年正月初六，张云龙与川南特派员廖维明（民），还有张树青、王云武等几

人，在长宁夏场活动，欲探听南溪情况，想东山再起，以接出狱中被关押的同志。不幸被该地夏场赌痞罗成云出卖，勾来长宁所辖的梅家场大地主担任民团大队长的樊宗伦，在夏场街上茶房里，将张（云龙）、廖（维民）二同志捕抓捆绑，而廖（维民）的气力很大，两手一挣，绳索全断，见者均惊讶，因而将廖（维民）枪杀于夏场场口上。继而将张云龙捆送来南溪，交给反动军阀政府，索取悬赏通缉张云龙的赏银三百元而去。张云龙一九二九年二月初五日，在南溪城内中大街十字口砍头示众。”

按：廖维民同志，又名霁初，内江人，是廖释惑烈士的兄弟。他的祖父廖学宽，原是农村的贫苦农民，因受不了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便迁到城内，以当力行、打零工为生。他的父亲从小就到一家铜匠铺里当学徒，出师后，自己开了一个小店营业。廖维民同志兄弟四人和一个妹妹。大哥廖划平（又名维中），二哥廖释惑（又名维华），四弟廖维国，妹妹廖苏华。

廖维民同志，很早就在外面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回到内江，曾和廖恩波、廖划平、廖释惑等人，传播革命思想，发展黎冠英、谢独开同志为团员，组织建立了内江团小组。后来，他参加黄埔军校第三期学习，毕业后，回川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九年初，廖维民同志任川南特派员到长宁县，和张云龙等人到夏场，了解南溪县李庄农民暴动失败后的情况，由于坏人的出卖，被反动武装在夏场抓捕，当场被杀，壮烈牺牲。

（宗 诚抄辑）

黎光谦烈士的壮烈牺牲及其生平事略

（1895—1930年）

黎裕康 供稿

黎光谦同志，又名黎用中、黎化名，1895年农历8月21日生于内江东兴镇蟠龙冲一个农民家庭。黎光谦的祖父黎正灿，在内江开设有“天庆元”绸缎店，为人正直，好打不平。1899年余栋臣率起义部队经过内江时，被官兵堵截，他曾带头组织群众声援义军队伍。黎光谦的父亲黎继熙，一生以教书为业，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私塾老教师。

黎光谦同志家里有兄弟妹妹共六人，他是长子，因家庭经济情况不好，自幼仅能在家塾中读一点旧书。四岁开始发蒙，由于天赋聪明，刻苦好学，成绩列于诸学童之前。十四岁即辍学，在石棬子一家亲友处教书，作小老师。教了两、三年，亲友讲：“教书也难得教，还是批点钱。”他把这很少的一点钱积攒起来，以便今后能再求学时用。十八岁时，黎光谦就读于资中联师。毕业后，又回到内江教书。先后曾在观音井、盐滩井、小葛仙等处教书，一般是当天去，当天回家住宿。继后又到曹家井教书，这里可在一家糖房里搭伙食，教书的时间较长，大概一直教了两、三年的时间。

1925年底，中共内江县特别支部建立，黎灌英同志为特别支部负责人，同年黎光谦等由黎灌英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黎光谦同志，在内江公学任职员。当时内江公学，也是由黎灌英同志以国民党临时县党部名义出面，而发起组织的。校址设在李氏宗祠

内，分初小、高小和特别班。黎灌英任校长，兼上政治课，教师有廖释惑、钟伯勋等人。在内江公学教学期间，黎灌英、廖释惑、黎光谦等同志，经常组织学生，在城内和四乡进行宣传，并更努力组织工会、农会，掀起了内江从未有过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宣传运动的高潮，使全县充满了蓬勃的革命气氛。在此时期，中共内江特别支部新吸收、发展了陈英其等进步学生入党，还保送了两名学生到泸州刘伯承同志主持的“泸州（纳溪）军政学校”学习。

1927年宁汉分裂，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后，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四川党组织转入地下斗争，内江党组织曾一度中断。1928年6月，川南特委派邓可非（女）到内江任特派员，进行恢复内江地下党的组织工作。邓可非住在太平街杨氏祠黎灌英同志的姐姐黎秀康家中，并与黎光谦、黎守中等七、八个党员接上了头，迅速恢复了党的组织活动。邓可非来内江不久，被敌人发觉派兵要抓她，在黎光谦的掩护下，乘夜出走，去到离城十多里的乡下，住在一个姓黎的农民家中。在这里，他们会到了川南特委书记刘远翔，根据特委的指示，邓可非即离开内江，另去邻近自贡的三多寨。

1929年初，为了更好地和劳动人民保持联系，便于白区地下革命活动的开展，县委决定组织委员黎光谦同志，在城外号子口土地庙附近，开了一家饭店，以供应行人歇脚、卖饭为掩护，暗作党开展活动的交通点。同时，黎光谦同志又由内江县中训育主任（当时又称监学）朱朝碧的介绍，在内江县中学校任稽查，以便与学校进步教师和学生保持联系。

1930年上年，内江县委负责人曾莱由省委调去重庆，川南特区又派高伯礼回内江任县委书记，黎光谦、廖释惑、周执中、傅宾阳等同志任县委委员。县委这时以农运工作为重心，由县杨家乡等地转移到石子、华山、白合乡一带。同年6月，石子乡正准备暴动，不料在城里张贴标语的驻军中的骨干陈杰被敌人发现，当场被捕，经不起敌人严刑拷打，投敌变节，暴露了组织的秘密，以致廖释惑、黎光汗、傅宾阳、张继文四同志，分别遭到敌人的逮捕。廖、黎、傅、张在狱中经受了敌人百般的威胁利诱，严刑拷打，坚贞不屈。1930年8月4日，是四烈士英勇就义的日子，四烈士在押赴刑场落虹桥的途中，沿途高呼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苏维埃万岁”！！黎光谦同志，身中七弹壮烈牺牲，遗体由亲友、家属以无比悲愤的心情，运回一德滩乡下进行安葬。烈士们为革命献身的光辉业绩，永远铭记在内江人民的心中。

吴笔耕同志的革命经历简介

吴 星 海

吴笔耕同志，内江县人，生于一九〇二年，私塾文化。父名吴戒三，商人。十六岁左右，父母相继亡故。大哥吴书浓，二哥吴默恬，先后出外谋生。吴笔耕与其姐吴警非，则跟随三叔吴炜三一道生活。当时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人民生活极端困苦。

一九二五年，吴笔耕随同高伯礼等内江同乡，一道前往广州，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三期，学习政治军事。此时改名为吴灵，年仅二十三岁。入学不久，经四川同乡吴玉章先生介

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兵分三路举行北伐，这是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当时的共产党人和黄埔军校的学生，就是国民革命军的骨干力量。这时，吴笔耕在叶挺将军所领导的第四军独立团的一个连作党代表，（臭名昭著的林彪，黄埔四期毕业后，即曾在他的连里作过排长。）跟随叶挺将军从广州出发进军北伐。当时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叶挺将军的独立团，是国民革命军的主力和先锋部队，英勇善战，所向无敌，在汀泗桥和贺胜桥两役中，击溃了北洋军阀吴佩孚的主力，奠定了北伐胜利的基础。名震中外，号称铁军。

一九二七年春，在北伐战争胜利的鼓舞下，在党的领导下，以湖南湖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猛烈开展。这时吴笔耕受武汉党组织的派遣，跟随内江同乡谢独行等到湖南平江、浏阳一带参加党的农运工作。

一九二七年七月，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和党组织的分派，吴笔耕回到部队，跟随叶挺将军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经过五小时激战，全歼守敌一万余人，占领了整个南昌城，宣告起义胜利，发表了《八一起义宣言》，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大军，包围南昌，形势危急，起义部队于八月五日撤出南昌，回师广东。沿途受到敌军阻击，九月底到达广东潮州、汕头后，又遭到优势敌军围攻，部队受到了极大的损失。吴笔耕跟随着保留下来的部队，退到海陆丰，与东江农民军汇合，参加了海陆丰的革命斗争。一九二七年十月，党领导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了海陆丰及其周围地区。十一月成立了以彭湃为主席的工农民主政府，开展了土地革命。一九二八年二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海陆丰的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坚持到四月，最后遭到失败。剩下来的部分工农武装，退到附近山区。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丧失后，吴笔耕由党组织派遣回四川工作。到了宜昌，由于四川党组织当时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省委工作，无人主持，因此失去联系，找不到接头人，便又折回广东。长途劳累，天气酷热，不幸染上恶疾，经广州医院医治无效，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病逝于广州医院。死时年仅二十六岁，尚未结婚。他的二哥吴默恬，为了纪念他，特将自己的二儿过继与笔耕，取名吴承叔。

吴笔耕同志，是大革命时代早期的共产党员，为革命，为理想，为人民，参加了一系列惊天动地的艰苦斗争。为壮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了他宝贵的青春和生命。

（上接19页）

之后，又将黄乃伦、胡露华弄去禁闭，但最后亦未被他们抓住任何东西。

这时，我已赴嘉定（即现乐山）参加武汉大学新生考试，得知内江伪县党部对我社加紧施加压力，有的社友被传讯，有的被抓捕。当我入学不久，社友函告，我社在多方威逼下，被迫解散了。

现回忆得起的社友有王竹村、谢碧芳、谢微若、童玉华、胡露华、闻化鱼、张图远、李懋刚、黄乃伦、曹克成、曾繁美、黄墨鲁、黎澈、陈德华、雷再熙、谢筱蕴、张丹书、陈靖方等。

△梅志尧同志，原曾任过一段时期兴华救亡歌咏话剧社副社长，现在成都市四川省农业机械局工作。

日寇飞机轰炸内江的罪行

傅科整理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飞机狂轰滥炸我后方城市。对内江的轰炸，共有两次，都在1941年。第一次的时间，是阳历7月28日；第二次的时间，经查访一致认为是阴历后六月三十（阳历8月22日）。

那时国民党政府在内江不说高射炮，飞机之类的所谓“积极防空”没有，就是“消极防空”的防空洞，也绝无仅有那么一两个。城里只有在现在旱桥和沱江旅馆上面，当时是成渝铁路局长的别墅（现在此房还在）房子的侧面，挖了一个防空洞，此外就没有了。当时所谓“防空”，实质就是疏散、“跑警报”。

日机空袭时，因为设有报警器，警报标志为：

1. 预行警报——敌机在武汉飞向四川时发预行警报。首先由县警报组在鼓楼（现中央路北口）敲钟，同时各乡镇（当时城内分城东、城南、城西、城北四镇，河对面为东兴镇）的传达手持红白旗一面在街上边走边喊“预行警报罗”。与此同时，在河对面月亮坝后的高山立的木杆上挂一个红灯笼（晚上灯笼点灯）。晚上各乡镇传达喊“预行警报罗”时，还边打更锣。那时每晚本来还打更的（二更到五更都要由打更匠打更锣报更），因为晚上预行警报用更锣来表示，所以内江城里这时打更改为敲梆梆，以便区别。

2. 空袭警报——敌机入川继续往西飞时，发空袭警报。这时鼓楼上敲第二次钟，河对面木杆上挂两个红灯笼来表示。

3. 紧急警报——敌机越过重庆往上飞时，发紧急警报。这时鼓楼上敲第三次急点钟，同时取下木杆上的红灯笼。

4. 解除警报——敌机已飞出川，发解除警报。这时在县府门前放一巨响“马蹄炮”，同时鼓楼上敲慢点钟来表示。

第一次空袭，~~窜~~敌机三架，轰炸了当时县政府大门内的牌坊处。牌坊原有三座，这次炸毁前面两座，~~解~~旁的一对石狮子也被炸烂。

另一处是脚盆田川中公路局内江车站附近，这里炸死二人，伤多人。

文英街现地区运输公司左侧被炸，也死伤一些人。原内江教育界前辈张诗伯老师的女儿翠蝶，也是在这次被炸死的。

第一次被炸的地方还有小西街李东来号（现天津街服装厂门市部），桂湖街马家花园对面，小东街（印刷街）现中医院斜对门。

第二次空袭共来敌机九架，从东北方向入市区后排成“一”字形投炸弹和燃烧弹，并低空扫射。这次被炸毁，烧毁房屋和死伤居民，都比前次的损失大得多。

这次被炸的地方有：

国民党县政府内，在现市政府礼堂处，炸成了一个十多米大的弹坑，那时这里有一棵大黄桷树，也都连根被掀起来。后来在这里修成了礼堂。县政府的左后侧接连大东街侯家祠堂（即现市教师进修校对面）后坡掉了几颗炸弹。县政府内监狱被炸，犯人逃跑的很多，从北渡浮水过河，自卫队到处追赶。

东坝街的万寿宫后面奎阁处连着水巷子苏家院被炸。万寿宫和乐堂左侧是当时的内江县邮局（即现内江市手管局百货店）被炸毁。和乐堂的对面也被炸毁，炸塌的房屋从东坝街一直连到小东街（印刷街），这一片被炸后在东坝街一面后来修建了内江县银行，小东街一面修了其昌银行。一说这一片是连炸带烧。

南街（现中央路）与小东街拐弯处原为广居茶楼，包括现清泉茶社（红艳百货店）一片也被炸。清泉茶社处炸后在那里开设“全民书局”。市政协礼堂当时为花纱堆栈，连着后面吴家巷一片被炸。南门口现市六中门口也中了弹，死伤多人。

箭道街（现工商街）与华陀街（现三八街）拐弯处和箭道街东口的余家院被炸。炸弹爆炸的气浪把条石掀起飞到余家院的晒楼上去。可见敌寇炸弹的破坏性是很大的。

华陀街北口现市烈军属敬老院被炸，从这里到街口被炸毁（烧毁后在街口修望江茶楼）。华陀街口另一侧连接小东街一片（即现在印刷街口百货店与理发店）被烧毁。

印刷街吴家巷对面和现中医院斜对面，都曾中弹。

下河坝的马福隆巷，好吃坝街、葛仙庙巷、新华木厂、团结街、胶行街、水巷子多处被炸。这次中燃烧弹的地方有：城内鼓楼东侧（现中央路水果店处），大西街（现人民路）中国银行（现邮电局处），东坝街万寿宫对面和河坝街。燃烧房屋最宽，损失惨重的是河坝街。这次燃烧弹投落在小南海笃生公药铺（即现人防影院隔壁药铺处），因天气亢阳，火势迅速向上下蔓延。待解除警报，消防队赶到，虽经奋勇扑灭，仍然下面烧到了王爷庙巷（现市航运公司处），上面烧到老禹庙（现市八中）巷。里侧沿着城墙，外侧接近十字口一线。约合面积一万六千平方米。这一带是内江当时商务繁华地区，是经营菜油、火麻、叶烟、山货、夏布、盐、煤、木材等行业的商业区。财产房屋损失无法估计。河坝街的贫民许多因此倾家荡产，还有的被烧死、炸死，有的甚至全家被难。

经过初步查访，得知被难的同胞情况如下：

1. 市建筑公司工人罗公友说：住小东门口的铁匠江海廷和妻子、小孩三人都被炸死在马福隆巷口（现团结一巷），孩子死在妈妈怀里。

2. 市人大常委高平章同志说：老禹庙斜对面开面房的林江海的母亲被烧焦，心脏都烧得爆了出来。

3. 退休工人阴荣崇（住团结街143号）说：在王爷庙巷新华木厂下面好吃坝街有一个廖豆花被炸死，肠肠肚肚暴露一旁。同上地点有个苏凉粉，一个三岁女儿和五岁女儿头部和上半部都炸来莫得了。真是好吓人，好惨呀！

4. 退休工人曾孝成（住团结街22号）说：马福隆巷车家院子一颗炸弹炸死有钟炳成全家人。还有住户张建高、伍国华、隆炳银和陈太平两娘母。一共炸八人。

5. 退休工人黄仕东（住团结街三巷37号）说：林麻花的妈，有八十多岁了，是活活被烧死的。梅葛庙陈利生的妈和家婆二人是炸死的。糟房张姓的女儿，头被炸去。

6.团结街33号八十多岁老人邓心田说：葛仙庙内（现市航运公司右手）炸死几个，河边土坡炸死几个。洪炳荣的妻子手被炸断死的。

7.原新华木厂店员，现退休工人王如伦说：住在我们厂下面的廖石匠双脚被炸断而死。附近还炸死十来个人。木厂的椅子堆上飞来一些猪尾巴，是附近喂“地游子”猪被炸死，可巧尾巴飞到椅子堆上了。

8.团结街135号居民隆桂仙说：邱培的姨妈躲在小南门大头户阴沟被炸死。

9.当时任消防队二中队分队长的饶泽民说：“炸第一次，我的哥饶炳生是在小东街中医院对门被炸死的。”

10.团结街135号居民熊怀碧说：王癞子的爱人和另外几个人是在县人委（团结街原内江县人委）对门被炸死的。

11.胜利街145号八十岁居民唐婆婆说：王爷庙巷邓国民的六姐两娘母是炸死的。谢婆一家三辈人也是炸死的。渡船口炸死一个小女娃。

12.退休工人吕荣兴（住团结街108号）说：王爷庙巷炸死吕荣生的妈。胶行街炸死一个姓黄的。

13.住文英街内江县邮电局附近居民罗水仙说：胶行街炸死她前房的姐姐—陈么娘，肚皮一个大洞，肠子都吊出来了。陈羊儿的奶母也是炸死的。

14.五居委主任何云松说：周培忠的妈是被炸死的。

15.退休工人张俊之（住工商街71号）说：“南门武庙（现六中门口）炸死十一人，惨哟，尸身不全，一副火板板装两个人。我亲眼看到的。”

16.退休工人林德卿（住益民巷10号）说：河街煤店对面酒店，炸死一个女的，头脚都没有了。真惨。

17.团结街74号附4号居民谢翠容说：她的母亲和兄弟嫂还有一个侄女一起被炸死，侄女小妹子还坐在椅子（几）头。

我们还访问到一位被破片打伤脚杆、女儿被炸死，房子烧光倾家荡产，丈夫活活气死的兰伯玉（76岁住团结街团结三巷）。她说：“我当家人刘万银在水巷子（现东渡码头到胜利街一段）开干号栈房（只供宿不供食的小旅店），有一个四岁女儿玉容。那年飞机轰炸，我牵着娃儿跑到河边。炸弹炸死了娃儿，我左脚杆也被打伤。栈房被火烧了，啥子都没得，当家人就活活气死了。我一个人生活都没得，哪有钱医病。后来脚杆尽到“灌”起不得好，脚杆烂久了，行肉我拿夹子（钳子）都怕夹了两磁碗下来。到现在脚都没好完，螺蛳拐都还是肿的。我跑到河边时，提了一个布包包，里头有些衣服和钱，我受伤后，我的包包也被拿去了。”

我们还访问到一位房子被炸塌自己躲在床下幸免于难的老太婆邱淑兰（82岁，邻居呼为谭么婆），邱淑兰现住三八街12号，她在1941年住在现烈军属敬老院里。她说：“我给邱家（当时房主姓邱）守朝门，帮人洗衣裳。当家人三十九岁就死了，我一把刷子盘两个娃儿。往回我都不跑警报，怕衣服‘错’（被盗），警报一来，邱家把门锁了，我就在屋里洗衣服，等警报解除了，我的衣裳也洗来亮起了。那年六月三十那回，要到‘晌午’了，警报来了，我的干儿问我：‘保保，你走了嘛！’我说：‘再等一下走！’他说：‘少做活路多做鞋，天晴落雨都要来。’他就走了。他刚一走，飞机就来了。散开了，我就吓倒了，赶紧朝

床底下躲，听到哗啦啦的来了，我赶忙把耳朵掩倒，眼睛闭倒。房子‘直是’（不断）垮下来。我掩到耳朵，我老大回来喊我，也没听到。隔壁王伯清也喊，喊了几道，我放开手，才听到，睁开眼睛一看，砖墙也倒了。我从床底“滚”出来，光穿双袜子从砖上踩出来，一臉花古里稀的，捡了些衣服在背篼头就往外跑。从南街跑到三道拐，又一口气跑到九角凼芭林头躲到。我的老大又跑回屋，哭着喊‘娘’，隔壁余老师的妈才说：“‘你娘跑出去了，鞋都没有穿。’他晓得我在九角凼洗衣裳，跑来找我，到处喊，一看到我就哭起来了。这回捡到一条命要，硬是吓了个好的。”（附：左邱淑兰老大娘像和其房屋原被炸处照片，及封底1941年日机轰炸内江城区示意图）。

按：（据《四川档案史料》1983年第3期载：“1941年7月28日，第一次日机轰炸内江投弹18枚，伤42人，死亡15人，损房45幢。毁房3幢；8月22日，第二次日机轰炸内江投弹44枚，烧夷弹7枚。伤123人，死亡72人，损房363幢，毁房470幢。特别是第二次河坝街被烧，除民房外，烧毁全部山货帮、夏布帮、叶烟水烟帮、油帮、火麻帮，盐帮的房间存货全部被毁，另有木厂（即木材店）、醸房各一间，药号2间被焚毁。）

（本文所记情况，主要多由阴钩陶、罗公友等同志所提供的，特此致谢和附志）



抗日时期内江的群众救亡宣传运动

——记内江兴华救亡歌咏话剧社

郭廷东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抗日战争的爆发，全国人民群情激愤，掀起了爱国救亡沸腾的热潮。位于西南大后方的内江进步的学校师生、社会知识青年广大群众，首先响应，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内江先后成立了以抗日救亡、民主进步为宗旨的群众文艺宣传组织有：“兴华宣传队”、“复兴宣传队”、“内江县兴华救亡歌咏话剧社”、“内江孩子剧团”、“内江县三·一三救亡歌剧社”、“抗敌剧社”、“沱风剧社”，以及“内江县抗敌歌咏团”。本文仅先就“内江县兴亡歌咏话剧社”的活动情况，作一单独的概要叙述（以下简称“兴华”）。

筹备与成立

早在1931年“9·18”事变之后，无家可归的东北难民几经辗转来到内江，在大街上悲愤地向大后方人民控诉日寇的残暴罪行，强占我国土地害得东北骨肉同胞，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惨遭蹂躏。内江人民敌忾同仇，很早前便展开过抵制日货等的爱国抗日各项实际行动。

1938年8月，紧接在中日战争的隆隆炮火声中，内江的进步中、小学教师，马上以文艺为武器，进行抗日宣传，相约成立了歌咏剧社。时逢内江县中三十三班，利用暑期组织的“兴华宣传队”和“复兴宣传队”去农村宣传抗日救亡归来，得知城里成立剧社的消息，他们不顾自己的即将毕业和升学，积极地参加剧社的筹备工作。

在筹备会上，经过讨论，一致通过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意，将救亡剧社，定名叫“兴华”。关于人选，初推白××为社长（浙江人，县国税局职员）、张盛彩为副社长，报请县政府立案，未批准。因外省人，不能在本地民众社团任职。乃另推张盛彩为社长（私立敦睦小学教师、训导主任），李树德为副社长（县一小男高部教师、国民党员）。并由张盛彩草拟申请书，经县政府批复，予以备案，准予成立。

1938年9月“内江县兴华救亡歌咏话剧社”，于北街私立敦睦小学（现市第一幼儿园）召开成立大会。大会《宣言》由王竹村（社会人士）起草，全体社员一致通过，并印发给全县的人民：“……象嫩芽一般的本社，在抗战的紧急烽火中成长起来了！……我们更加相信，法西斯疯狗是专欺侮弱小民族的，我们要使他不咬，只有一个法子，‘打、打、打，’打出我们的地界去？……我们所能团在一块儿来做的，便是宣传工作，而我们选择的工作部门是‘剧’与‘歌’（摘自中共内江地下党史展览资料）。”该社成立不久，便租到上南街何家祠（现市川剧团侧），一间约二十平方米的小屋作为社址。临街一面挂着立式的剧社全称吊牌，标志着内江县抗日救亡运动新军的崛起。

多种多样的救亡文艺宣传形式

宣传活动的开展，得到了群众的大力支持，剧社由40多人，很快发展达90多人。社的成员有中小学教师、中学学生、机关职员、社会人士和求业青年，15名教师是主要骨干。他们抓紧课余、工余、假日、节日展开各种宣传活动；利用寒、暑假则作范围大、时间长的巡回演出。社员间推行民主生活，建立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学习制度，有事大家一起商量，有工作大家互相帮助。剧社下设歌咏、剧务、社会教育、总务四组，一说为六组，分别进行宣传、教歌、演讲、排演、壁报、采访、募捐和交际等工作。四个组设组长一人，组员则不固定，统一分派各项工作。社员胸前佩戴着醒目的社徽，社徽呈五角星形状，星内有五瓣白色梅花图案，花中刻有“兴华”二字。过去梅花曾定为国花，寓“兴中华，爱祖国”之意。

“兴华”剧社，密切配合抗日，先后演唱的抗日歌曲和上演的街头剧、活报剧、话（歌）剧共三十多个。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抗敌救国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保卫大武汉》、《游击队之歌》、《打杀汉奸歌》、《枪口对外，齐步向前》、《黄河大合唱》、《铁蹄下的歌女》、《寒衣曲》等；上演的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崔嵬等作）、《保卫芦沟桥》（夏衍等作）、《中国妇女》（赵清阁作）、《重逢》（于伶作）、《八百壮士》、《三江好》（左联集体执笔），以及《菱姑》、《血债》、《盲哑人》及《一个工人》（当时内江地下县委书记闻化鱼作）等歌、话剧剧目。

剧社表面曾经立案成立，但却未获得政府的实际支持。没有经费，便发动社员自身捐助